

# 第四届“卿云杯”全国通识课程论文大赛 封面

学校	华东师范大学	院系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专业	汉语国际教育	姓名	常高燃
年级	2021 级	任课教师	倪文尖
课程名称	语文名篇研习		
论文题目	故乡和异乡的生命长诗——空间视域下的《伍子胥》研究		

# 故乡和异乡的生命长诗

## ——空间视域下的《伍子胥》研究

**【摘要】**抗战时期，漂泊多地并最终暂居昆明的冯至于 1942 年写就《伍子胥》一书。尽管伍子胥的故事作为一段历史形成了阅读小说的前经验，但冯至并未书写伍子胥的全部复仇历史，而是选取了他为前往吴国寻求复仇之计，从城父出发，途径多地，并最终抵达吴市的漂泊经历。空间是其中重要的要素之一，因此，拟从空间出发，比较故乡和城父相同的平原形态，发掘其中蕴含的故乡的精神力量；并通过分析文本对故乡的悬置，转向探究在流浪过程中，伍子胥如何在异乡的空间辗转里获得成长，最后考察其中折射的面对四十年代的特殊语境时，作者本人的思考和抉择。

**【关键词】**平原；故乡；异乡；山水；生命力量

### 一、绪言

《伍子胥》是冯至在 1942 年所创作的小说，而事实上，正如冯至在《伍子胥》的“后记”中已经提到的，小说的诞生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从最先受到里尔克的散文诗《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的启发，幻想着一个有关伍子胥的浪漫的旅程、奇异的流浪；再到收到友人梁遇春去世的消息后看到岛上海鸥的飞没、之后受抗战的影响而流离转徙于多个城市，伍子胥的故事不断浮现于脑海，而这时的“他渐渐脱去了浪漫的衣裳，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练着的人”<sup>1</sup>；最终在 1942 年，阅读卞之琳所翻译的昔日钟爱的里尔克的《旗手》时，关于伍子胥的故事终于在时空绵延中逐渐成形，经历了重重变迁之后，成为了“一个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德赛’”。

这样曲折的创作历史一面映射着冯至的漂泊经历史，一面又指向了他的思想形成史，两者交杂相糅，共同促成了《伍子胥》的写作。事实上，冯至的思想样态深深勾连着他的德语背景。在大学时，他便就读于德语系，阅读并翻译了大量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之后又赴德国留学，深入学习并研究德国的文学、哲学和艺术，并以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回国之后，冯至担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德语教授，并继续引介里尔克、歌德等人的著作。德语文化深深植入到他自身的成长之中，其思想受到了德国浪漫派以及与之相关的歌德、里尔克等人的影响。1937~1938 年，由于抗战爆发，冯至随同济大学从上海先后迁往浙江金华、江西赣州，一路颠簸流离，经过广西，最终抵达云南昆明。1939 年，冯至暂居于昆明郊外的杨家山林场。漂泊的经历和昆明的山水给予冯至别样的体验，而当再次受到里尔克《旗手》的召唤时，一部著作终于缓缓降临。

### 二、从平原走入平原

<sup>1</sup> 冯至：《伍子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142 页。

小说中，伍子胥从城父出走，一路辗转，途径林泽、洧滨、宛丘、昭关、江上、溧水、延陵等地，最终抵达了吴市。而小说也就在这一往长途的终点停下、在开展复仇的伊始驻足。冯至在《伍子胥》的后记中曾谈到：“我们常常看见有人拾起一个有分量的东西，一块石片或是一个球，无所谓地向远方一抛，那东西从抛出到落下，在空中便画出一个美丽的弧。这弧形一瞬间就不见了，但是在这中间却有无数的刹那，每一刹那都有停留，每一刹那都有陨落。”<sup>2</sup>本篇小说正是这样一种抛掷到跌落、出走到抵达的所经所历、所知所感。

自然，空间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关注要素。首先，平原构成了伍子胥出走的原初空间形态。他的故乡郢城在“九百里的云梦泽”：“昼夜不息的江水，水上有凌波漫步、含睇宜笑的水神；云雾从西方的山岳里飘来，从云师雨师的拥戴中显露出披荷衣、系蕙带、张孔雀盖、翡翠旗的司命。”平原湖沼交替遍布、纵横相连，江上云雾缭绕、水汽丰盈。这些不断滋养和塑造着伍子胥：“若是回想起他们的幼年，便觉得自己像是从肥沃的原野里生长出来的两棵树。”而当伍子胥从城父启程，踏上复仇之路，他知道，他将“怀念着故乡的景色，故乡的神祇……子胥却走到远方，为了再回来，好把那幅已经卷起来的美丽的画图又重新展开。”

有学者已经指出：“对伍子胥而言，故乡首先是一种实存性的地理概念，其次是可以安放漂泊的灵魂、抚慰其精神焦灼的文化场域。”<sup>3</sup>事实上，故乡的这幅画卷从未真正合上，而是平原式地铺展在其流亡的一路长途之中，陪伴着他的每一次出发，每一程跋涉。在之后空间的辗转中，伍子胥不断回头，反复遥望和念起故乡。在宛丘附近的一座座墓园中，他从楚国的驻军想到故乡里那些蕴藏原始力量的人们；在昭关高耸的荒山下，潺潺的溪流仿佛带他回到了不曾被污辱的故乡；立在涉江的船头，滔滔的江水牵起他对故乡流离失所的乡民的担忧；在延陵，踌躇于拜见季札之时，故乡的温情给予其继续前行的力量……而伍子胥就在这频频的回首中，一次次重温 and 体认着来自原初空间对自我的全部哺育和慰藉。而故乡，已然转化成为一种横向式的动力源泉、“一种鼓动的力量”<sup>4</sup>，并在这一望无际中纵横驰骋，以其自身的形态给予伍子胥无限的绵长和广阔，成为其漫长流亡的精神归依。

伍子胥的出发之地城父虽然同样是平原的地貌形态，却给予他迥异的生命体悟。城父坐落在黄色的平原之上：“不论走出哪一方向的城门，放眼望去，只是黄色的平原，无边无际，从远方传不来一点消息。”城父的开阔平坦没有导向络绎不绝的繁荣，没有同样成为故乡式的慰藉。相反，平原的无尽带来的是无所依托和倚靠，是难寻出口和终界，直至它与外界失联，被逐渐疏远和遗忘。甚至它“自己也仿佛失去了重心，无时不在空中漂浮着”，茫然而虚妄地游荡。同时，与外界形成的“隔膜”似乎已经被物化，层层包裹着城父，使得广阔之上，其却日益狭窄。因而，伍

<sup>2</sup> 冯至：《伍子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41页。

<sup>3</sup> 赵双花：《在回归原初中汲取战胜现实的力量——冯至历史小说〈伍子胥〉叙事意蕴再解读》，《燕赵中文学刊》，2023年第1期，第86-100页。

<sup>4</sup> 赵双花：《在回归原初中汲取战胜现实的力量——冯至历史小说〈伍子胥〉叙事意蕴再解读》，《燕赵中文学刊》，2023年第1期，第86-100页。

子胥感到“如今被移植在一个窄小贫瘠的盆子里，他们若想继续生长，只有希望这个盆子的破裂。”

然而，对于伍子胥来说，这片空间在对其施以桎梏的同时，也在孕育和催化着他成为城父自身的掘墓者，不断逆向逼迫着他的突围——正是在空间趋向虚化和窄化的另一面，仇恨随之萌芽：伍子胥的“焦躁与忍耐在他的身内交战，仇恨在他的血里滋养着，”生活在此处，“在侮辱与骄傲的中间，仇恨的果实一天一天地在成熟”。这片空间的漂浮游荡和异常窄化使得仇恨在其中恣意生长，不断积累。而面对此处陷入迷途的惘然的虚空、置身这片被重重包围的窄化的逼仄，若要“继续生长”，伍子胥必须向下沉落、向外累积。而仇恨正给予了伍子胥这样一种突围的重量。正如在兄弟分别之际，伍奢向伍子胥的嘱托：“我的面前是一个死，但是穿过这个死以后，我也有一个辽远的路程，重大的责任：将来你走入荒山，走入大泽，走入人烟稠密的城市，一旦感到空虚，感到生命的烟一般缥缈、羽毛一般轻的时刻，我的死就是一个大的重量，一个沉的负担，在你身上，使你感到真实，感到生命的分量，——你还要一步步地前进。”由此看到，城父中所生发的仇恨有着纵向的重力能量，但它并非是落在伍子胥肩头、拖累其远行、使其步子沉重不堪的重担。相反，仇恨不断加重他的责任、沉淀他的步伐，使其每一步都充满分量、掷地有声。从而，伍子胥才获得了去冲破长期困滞自身的这种特殊的空间结构的可能，并能够坚定而沉着地走向他乡。

同样是作为平原的空间结构，却对伍子胥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导向和结果。前者是他的精神归依和情感慰藉，而后者则成为了他成长的阻滞和桎梏。事实上，尽管他从一重平原踏入另一重平原，但在伍子胥离开故乡之后，这一地貌形态也随之消殒。再未有平原能够置换生命最初的原野，再没有空间能够真正替代故乡。虽然城父曾经提供给他长期的生存空间，但那里早已是“异乡”，他也已然处在了漂泊之中。因而，城父并不是其出走的原点，流浪在他被迫离开郢城的伊始豁然发生。而在小说中，伍子胥也在不断重申自己“（却）要走到远方，为了再回来”。因此，流浪背后的这样一种“还乡”意识勾连起全部空间的辗转起伏，构成了伍子胥漂泊的重要动力来源。

### 三、未能返还的故乡

然而吊诡的是，尽管还乡意识贯穿着小说始终，但故事却是在流浪的终点、在伍子胥到达吴市之后戛然而止。小说之中，伍子胥未能完成他的“还乡”，重新回去隐没在了文本之外。故乡，成为了伍子胥从未能抵达、从未能进入、从未能回还，而被高高悬置的空间。故乡在小说中也并非被直接展现，常常是停留在时间的深处，通过不断地回望与回忆来被逐步描绘和书写，并在其中完成了它自身的确立、塑造和建构。这一过程指向了两面：当故乡被回忆时，它便从空间形态转变成时间概念，置于了历史的深处，与伍子胥所在的此刻生发出不可跨越的时间隔膜；而当故乡被回首时，已经预示了其于伍子胥之间的空间距离，他也正是在立足于距离之

外去回望的时候，才获得了对故乡的全知体验，才感受到了这一空间的鲜明在场。地域空间的时间转化，距离先行的在场认知——一切都是难以返回的历史，一切都是无法进入的场域。故而，时间落差和空间距离的双向结合不断强化和彰显着抵达故乡的不可能。

当故乡被鲜明认知，又被高高悬置，异乡的意义也愈加凸显。这深深关联着冯至本人对故乡和异乡的认识。学者邢斌曾经结合冯至的诗歌创作，对他的故乡感知和异乡想象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指出相对于故乡来说，冯至对异乡拥有着更为亲近的距离、更为丰富的情感：“这个‘新奇的国土’正针对着现实里黯淡的故都，但另一方面也暗示着更为广远的自由空间：逃离虚浮无聊的存在状态。相对于故园中‘永恒的寂寞’，异乡天然地具有某种难以言传的生命活跃性……”<sup>5</sup>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伍子胥》中，冯至将故乡悬置，从而能将更多笔墨倾注于对异乡的书写，让故乡凝滞在已经远去的起点，促使伍子胥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进入更多的别样的空间，去发掘其中所蕴藏的力量，去体验并激发生命的自由和活跃。

影响冯至至深的德国浪漫派诗人和理论家诺瓦利斯曾有过这样一段有关他的“走向内心”的论述：“现在我们看见那根连接主观与客观的真实细线了。同时我们发现，我们的内心也存在一个外部世界，它同我们内心的联系正类似于我们身体的外部世界同我们外表的联系。内心的外部世界同身外的外部世界二者是紧密相连的。如同我们内心同外表紧密相连一样。”<sup>6</sup>同时，诺瓦利斯认为，通过“走向内心”，我们能够获得与世界的联系：“当我们认识了自己，我们就认识了世界，因为我们与它是完整之半。”<sup>7</sup>而小说则倒置了这一过程。当伍子胥踏上“异乡”的旅程，这一“身外”走向“外部世界”的过程也是心灵走向“外部世界”的过程，当“身外”去发现全新的山水、去探索异乡的风景，“内心”也正在这样的外部世界之中感受着重重路程的变换，体验着层层空间的历练，并从中获取着生长的不竭动力。因此，与其说这是一个关于个体精神归乡的故事，不如说其更多指向的是关于个体如何在异乡中获得成长，如何在多重空间的流动漂泊里，发现和创造自我的长诗。

而这也链接到作者本人的生活语境之中。1942年，正值战乱的年代，冯至历经了重重的颠簸、漫长的飘零，才终于寻得在大后方昆明的山水中的短暂的安宁。他那位于广袤的华北平原的故乡涿州早已弥漫浓浓硝烟之中，被重重的战火包围，只能在遥远的回首和记忆中，辨得它的残貌。他要考虑的不是如何还乡，如何返回至原初的空间当中，而是如何整理收拾好颠沛中的种种遗落，重新让自我融入到当下，去回应潜藏的流离和未知的羁旅，去直面战争的危机和国家的患难，时刻准备着再次出发和重新上路，拥抱从未停息的漫长迁徙和随时可能的漂泊奔波，踏上战火连绵的艰险之途和救亡卫国的坎坷道路。作者自己也渴望着在这样的历程当中，

<sup>5</sup> 邢斌：《“异乡”母题与“元历史”想象——论冯至现代期的创作》，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3年，第67页。

<sup>6</sup> 冯至：《冯至全集·第七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0页。

<sup>7</sup> 曹霞，《寻找内在的和谐：诺瓦利斯的“走向内心”》，《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1期，第142-146页。

走向内心，获得精神的体验和心灵的成长；也面向世界，以个人的力量去回应家国危机。

#### 四、在异乡形成主体

伍子胥就这样从异乡出走，以城父为始继续着他的流浪之旅。历来研究者注意到在这一过程中渔夫、漂水女子、季札等等所遇之人对他生命的启发，并系统分析了其中潜藏的隐喻命题。譬如学者赵双花曾指出“江上”和“漂水”一节是“将人与人的关系还原为一方乐于施予、另一方感恩般地接受，和谐、明朗……双方彼此给予而没有精神负担——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理想关系。”<sup>8</sup>

除此之外，不可忽视的是旅途之中并非全是一马平川，相反，其间山水蜿蜒，沟壑纵横。从林莽沼泽至洧水之滨，从寂寂小道至缓缓宛丘，从夜色的墓园到昭关的荒山，从无名的江上到柔情的漂水……这些所历空间的山川地势也同样参与着这一过程。因而这一路长途，兜兜转转，走走停停，伍子胥虽然只是短暂地进入到一处空间里，然后继续向前行进，但他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敏感：他的视线时刻向四周游走，用目光试图探寻所有的足迹已至和未曾到达；他的感官高度灵敏，沿途之中，每一次地形的更迭和每一片风景的改变都无时不刻地挑拨、扰动着他。它们触碰着他的感觉、参与至他的体验、渗透入他的情绪、敲击着他的知觉，游走进他的心境、牵连起他的思考。此时的伍子胥可以说正处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被抛”的存在状态当中，他被抛入至这重重山水之中，面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在未知的动荡和危险中踽踽前行。而它们不断激活和触发着他的情绪，而他也正是在所感悟到的喜怒哀乐中，在反复的牵挂和操持里，踏上了去往并领会存在的遥遥之路。异乡就在参与其精神流浪的过程中，建构、塑造和形成着这一个体。它们在目睹伍子胥的痛苦与挣扎之时，也见证着这一生命如何在万里天地间跋涉，如何面对可能，不断筹划自身，向着开放坚韧的成长。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极其强调“孤独”在人之生存中的重要作用，冯至虽然吸收了这一“孤独”的思想，但并未将它推向极端化，而是也借鉴了曾作为其博士论文答辩主考的雅思贝尔斯所倡导的人与人之间的“交通”概念，即：“个人不能依靠其本身而成为人的‘自我存在’，只有与另一个‘自我存在’相交通时才是实在的。当我孤独时，我便陷入阴沉的孤立状态——只有在与他人相处时，‘我’才能在相互发现的活动中被显示出来。”<sup>9</sup>学者杨志注意到：“冯至将里尔克的‘孤独’与雅思贝尔斯的‘交通’相融合。既强调‘孤独’，又强调‘交通’。”同时，他也发现：“雅思贝尔斯反对人把自然作为逃避他人、逃避交通的场所。这一观点对冯至山水观念的形成有相当影响。冯至把它与道家的山水观念相融合，表现了一种新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交通的山水观念。”<sup>10</sup>伍子胥主动地走入到当下的空间，观察着每一寸山

<sup>8</sup> 赵双花：《在回归原初中汲取战胜现实的力量——冯至历史小说〈伍子胥〉叙事意蕴再解读》，《燕赵中文学刊》，2023年第1期，第86-100页。

<sup>9</sup> [美]考夫曼编：《存在主义·从陀斯妥也夫斯基到沙特》，陈鼓应、孟祥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49~150页。

<sup>10</sup> 杨志：《从德国浪漫派到存在主义——论冯至对德语文化的接受与消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

水，这正是他在保持个体孤独、感受主体体验的基础上，开展着与山水的“交通”。他未将空间作为一个逃避性的“乌托邦”的场域，而是视其为可以体认和交互的对象，并延续着浪漫派所倡导的“将主体的自我、精神、意识等投射到自然界中的客体中，去使物化自然转变成精神的自我体现”<sup>11</sup>，实现了个体与空间的连接。

## 五、从主体走向世界

只是此时，面对所至空间中的山水、所逢地域中的他人，尽管目光的驰骋和感官的活跃均来自于他自身，但从来都只是他去体察空间中的景与物、人与事，从来都是他单方面地接受沿途给予自我的感受和影响，主体本身更多的是呈现出被动和矮化的一面。直到他行至溧水之时，这一关系发生了颠倒。

伍子胥终于抵达吴国，终于来到彻底意义上的“异乡”，相逢一位溧水女子给予他一钵饭食。此时，不止有伍子胥对女子和溧水的认识和感知，他也被置入了对立面，成为女子所观察和思索的对象。她所看到的伍子胥“空虚的，瘦长的身体柔韧得像风里的芦管一般，但是这身体负担着一个沉重的事物，也正如河边的芦苇负担着一片乌云、一场未来的暴风雨。”同时，她也被这一场景所影响：“她眼前的宇宙好像静息了几千年，这一刻忽然来了一个远方的人，冲破了这里的静息，远远近近都发出和谐的笑声——刹那间，她似乎知道了许多事体”，并且，她拥有了如梦境一般的感觉，使“她眼前一度分明的世界”朦胧不清，他们也共同留给这片空间“一幅万古常新的图画”，并“永久留在人类的原野里，成为人类史上重要的一章”。

而如果说此时伍子胥对他处和他人的作用仍然是在无意中发生的；那么很快，在抵达吴市之后，伍子胥已然在主动发挥着个体的力量：他一步步进入其中，“披着头发、面貌黧黑，赤裸着脚，高高的身体立在来来往往的人们中间”，缓缓吹起手中的排箫：箫声描绘着江水、原野、湖泽、森林、山峰，月夜的渔船、馈饭的女子、平凡的夫妇，正如伍子胥所走过的山川江河、所历经的众多奇遇；箫声时而悲壮感人、时而哀伤婉转，时而平缓悠扬、奔腾跳跃，正如回望这一往长途，空间辗转流动，景色变幻流转；箫声使人们沉醉——“人人仰望着这座高峰，像是中了魔一般，脚再也离不开他们踩着的地面”，正如伍子胥所被山水吸引的纵横驰骋的目光；箫声不断变换的音调牵引着人们的心情，使人忧郁悲伤、亦或是宁静悠然，正如沿途之景不断勾连起伍子胥的心绪……伍子胥连同他的排箫一起，似乎也化作了山川河流、化作了清晨月夜，成为一方方景色、一处处山水，一重重空间，于是仿佛山川起落都归于一处，曾经辗转起伏都聚于一方，他将它们所给予他的一切通过箫声传向听箫的人们，给予了吴市，给了这漂泊的终途。

当伍子胥抵达最终的异乡，自我却已然化为异乡的空间，将旅程曾在他生命中所留下的山川人事的痕迹，也以空间的形态施予这片异乡。他一面回溯曾经的行路，一面也在主动地重新绘制它们，填充着更丰富的细节、拓展为更广阔的世界。

---

第5期，第207-221页。

<sup>11</sup> 杨志：《从德国浪漫派到存在主义——论冯至对德语文化的接受与消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5期，第207-221页。

“图画”最终“展开”，但最终展开的却是自我的空间，其上是来自异乡却由自我创造的风景。生命的力量也由此彰显。他并不抗拒空间在他的生命上留下痕迹、不抗拒它们对他的历练和塑造。同时，他能够主动投身于这一过程，并在其中汲取养料、获得成长，并自然地去取得主动权，让自我予空间以回应、反馈，乃至一一影响。生命接受着这一过程，然后，掌控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实现了对浪漫派的突破。浪漫派虽然始终坚持个人对自然的重新发现和情感投射，但是卢卡奇已经在《心灵与形式》中指出：“浪漫派生活哲学的本质是被动的体验能力占据支配地位，尽管这一点还没有被他们完全意识到……他们使命运变成了诗，但既没有造就它也没有征服它。他们所走的通向内心的道路，只通向所有事实的有机结合、事物影像的一个美丽和谐，而不是对事物的控制。”而反观该小说，它沿着浪漫派的路径不断向前，却在行走的历程中予以反拨和突破，不仅让这一被动关系发生反转颠倒，而且抵达至存在主义的原初，回溯至自我本身，从内部出发，在塑造自身、领悟存在之时，也让世界获得生命的无限潜能和张力，使天地得以此在的生长和完成中成形和显现。

正如作者本人在他漂泊流浪的生命里程之中，早已阅过无数重重的空间，当下所寄居的昆明中的山水又给予其无限慰藉。但如今横在冯至眼前的难题是，如何让生命的山水去回应战乱的时代，去启蒙潦苦的人们。学者罗雅琳已经发现，伍子胥通过吹箫，“走向‘人群’与‘广场’的过程，正是‘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投身民众启蒙的一个缩影……构成了冯至对于知识分子职责的思考”<sup>12</sup>，寓意着冯至心怀的万千生民和山河。然而，当冯至将伍子胥在沿途中所真切切实的体验到的全部经历，只是通过箫声的隐喻、通过诗化的形式来作用于群众，而却在伍子胥即将施展实际的复仇行动时，让小说戛然而止，已经表明面对投身战乱、走向群众的问题，尚未能寻求到确定而具体的答案和路径。尽管所历经的辛酸与周转推动其让最初构想的一个充满浪漫主义色调的伍子胥“脱去了浪漫的衣裳，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炼着的人”<sup>13</sup>，但在异乡的终途，作者却将一份沉重的责任寄予箫声的翩连婉转，正折射着作者当前的理想饱含虚幻和未成形态。那些不予书写的关于伍子胥后来在异乡的起落沉浮正隐没了冯至未曾展露、缠绕纷繁的犹疑与沉思。他仍然历经着思想的痛苦纠乱，在决断面前依旧反复地流连徘徊。

四十年代的特殊背景提供了这个时期的作家丰富的迁徙经历和艰难的跋涉路途，并在他们的笔下转换成为广阔的世界和深沉的思考。而这场残酷的战争又使得个人命运和家国存亡如此环环相扣，他们所书写的不只是个人的成长史，更指向和浓缩着国家和民族的可能去向。《伍子胥》中正蕴含着作者这样的思索与抉择，只是一切都在形成之中，空间的变换仍在继续，生命的长诗依旧吟唱，主体与山水在彼此交融中形成了整全，而其却并非终路。当伍子胥将手中的排箫换作利剑，冯至最

<sup>12</sup> 罗雅琳：《〈伍子胥〉中的政治时刻——冯至的西学渊源与20世纪40年代的“转向”》，《文艺研究》，2018年第5期，第62-72页。

<sup>13</sup> 冯至：《伍子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41页。



终必将迎来他的决断时刻。